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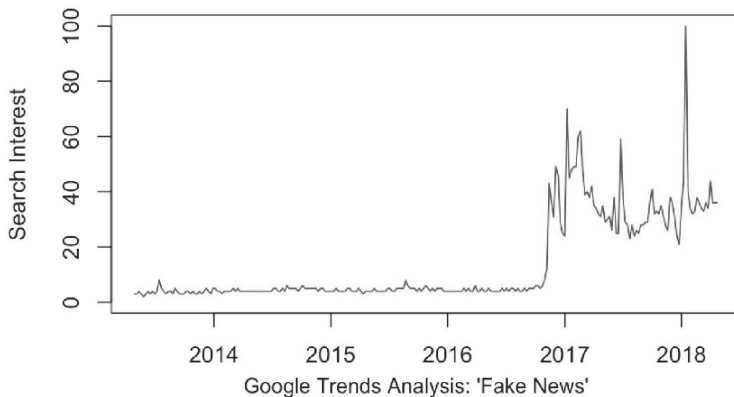
數位時代的假新聞*

What is Fake News in the Digital Age?

施達妮 (Daniela Stockmann) 撰，顏好恬 (Rebecca Yen) 譯**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裡，特別是在此刻，當我們從歷史角度觀察假新聞，似乎比以往更有意義之時。在歐洲和美國的公開討論中，在數位媒體出現之前，幾乎沒有人提到假新聞這個問題，我想從歷史的角度向大家學習更多有關假新聞在中國的相關內容。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過去兩年，假新聞的概念越來越受關注，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後不久，假新聞受到的關注飆升。你可以看到 2016 年 11 月之後，假新聞在 Google 搜尋次數大幅增加。政府越來越擔心社交媒體和假新聞之間的聯繫，因為它被認為與民粹主義的興起和



歐洲極右翼政黨的崛起有關。這些事態發展被認為是非常具有破壞性的，導致衝突，並在更廣泛地破壞政治制度和社會的穩定。

當然，假新聞一詞有很多定義，其中一些經常被用於媒體研究。Lazer et al 於 2018 年將虛假新聞定義為「模仿新聞媒體內容而非其組織或意圖的捏造信息」；這是一個相當含糊的定義。同樣，Facebook 也有一個相當模糊的定義，Facebook 偏好使用「錯誤新聞」，而不是假新聞一詞，將其定義為「聲稱是事實的新聞文章，但其中含有故意錯誤的事實，意圖喚起激情，吸引或欺騙閱聽人」。這些定義都含糊不清，我相信你們當中許多人在使用這些定義時都曾遇到困難。

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媒體或廣義而言，媒體，特別是數位媒體的學者，我發現假新聞在實務經驗上難以掌握。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我試圖尋找方法來發現並評估假新聞的趨勢，在今天的談話中，將提出一個我和我的學生一直在研究的工作定義，我們嘗試在實踐中檢測假新聞時，發現它非常有用，既可用於研究，也可用於制定政策。這是一個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所以我非常歡迎大家在今天的會議上發表意見和反饋。

* 本文原發表於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於 2018 年 6 月 7-8 日舉辦「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

** 作者為德國赫爾蒂行政學院教授。其最重要的著作是 2013 年出版的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中國媒體商業化和威權主義) 獲得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公共行政學院「蕭倫斯坦媒體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頒發的 2015 年金書獎 (2015 Goldsmith Book Prize awarded by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她近期的研究計畫則是探討了社交媒體平臺對用戶在政治行為方面的影響，獲得非常重要的歐洲研究委員會前瞻研究計畫的補助 (Starting Grant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譯者為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生。

為此，我將今天的演講集中討論三個方面。首先，信息在數位領域被誤傳的幾種形式；第二，數位時代假新聞的具體內容；第三，處理數位領域中的假新聞的幾種方法。

一、信息在數位領域被誤傳的幾種形式

我認為 Claire Warlde 的概念對於研究定義最有幫助。Claire Warlde 是非營利組織 First Draft 的研究員。該組織設立在美國，由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 Shorenstein 中心資助。Warlde 於 2017 年區分了 7 種不恰當使用信息的形式，包括 1. Satire、2. False connection、3. Misleading content、4. False context、5. Imposter content、6. Manipulated content、7. Fabricated content。在數位領域，這些形式並無不同，我將在後面的演講中評論他們在數位領域中所出現的方式，且讓我一一說明。1-3 項不一定是假新聞，而 4-7 項則與假新聞更緊密相關。

Satire 是「諷刺或戲仿」，這些內容不是為了造成任何傷害，但確實可能使讀者感到困惑。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名為 Onion 的諷刺網站上捏造故事的例子，你可能有看過。有些讀者可能不明白這是虛假的信息，而有時在其他國家的媒體，例如在伊朗，報導了這是真實的信息，並將其作為真實新聞發布給他們國家的觀眾。

False connection 稱為「錯誤鏈結」。錯誤鏈結就是「當標題、圖片或說明與文章內容不符的情況」。新聞故事的不同部分之間的這種不匹配，會使讀者感到困惑或潛在地造成錯誤的敘述。例如，這篇文章聲稱英國電視台 CNN 將因收視率低而關閉。顯然這是錯的，因為 CNN 仍非常活躍。然而，收視率下降的信息則是真的。

Misleading content 與錯誤鏈結類似，但程度不同。「誤導性內容」比錯誤鏈結更進一步，指的是對信息框架的操縱。例如，「獨立報」聲稱紅頭髮的人將因氣候變化而滅絕。不同於錯誤鏈結，這是誤導性信息，因為它結合了許多關於進化適應過程的錯誤和誤導性陳述。事實上，紅頭髮是由單個基因引起的，並且在整個人口中存在約 4-5%，這使得它在蘇格蘭的比例非常罕見。這些基因本身並不會消亡，它們可以隨時間變化，但變化非常緩慢，比氣候變化慢得多。此外，尚不清楚為什

麼基因會發生變化，這與蘇格蘭缺乏陽光有關的解釋在科學上尚未得到證實。還有其他解釋，如基因的隨機變化。因此，「獨立報」中的聲明結合了許多關於進化適應過程的錯誤和誤導性陳述。

到目前為止，以上三個例子中的相似之處，在於它們不一定是為了造成傷害而被創造的。因此，它們通常可以被稱為「錯誤信息」（misinformation）。而錯誤信息仍然是假信息，但由於沒有打算欺騙閱聽人，所以不同於其他更嚴重的形式。虛假信息（disinformation）和錯誤信息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意圖」。

當記者不檢查他們從來源獲得的信息時，可能會產生錯誤信息，因此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經常發生在他們處於緊急或危機情況的時間壓力之下。這種情況也可能發生在諸如恐怖襲擊等危機局勢時，記者可能會被迫在實際準確檢查事實之前立即公布信息。他們這樣做，首先是他們認為快速出版是他們對社會的義務，也因為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新聞業中，記者試圖成為第一個發表故事的人。大多數情況下，錯誤信息是單一事件，它們通常並不是更廣泛的宣導活動的一部分，它們並不意圖造成任何傷害。只有當它們成為惡意的虛假宣傳活動的一部分時，其影響才有可能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且讓我解釋傳播學者所稱「虛假宣傳活動」的意思。虛假宣傳活動的目的，是通過在短期內推進具體的政策目標，或引入長期的政策變化來影響公眾輿論。媒體學者認為，虛假宣傳活動有 90% 的比例包含正確的信息，但卻是言外之意等等的微小 10% 會造成負面影響。虛假宣傳活動是將人們希望成真的信息以及難以分辨的虛假信息的巧妙組合。

在媒體學界中，假新聞是否涵蓋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尚未有共識。部分學者將假新聞定義為只有虛假信息。其他人則稱假新聞只有在出於政治動機時才被稱為假新聞。今天的定義屬於第三種，也就是有些人認為，造成問題的假新聞是虛假宣傳活動的一部分，可能同時包含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我接著舉出的下面四個例子，都是假新聞作為虛假信息的例子。

虛假信息的第一個例子是「虛假上下文」（False context）。虛假上下文是「以真實內容構成的虛假上下文信息」。當新聞報導提供的信息事實上是正確的，例

如真實的圖片，但是在與文字描述完全不符的上下文中使用時，就是這種情況。2018年3月28日川普一則關於參加會議討論計劃在美墨邊境修建一堵牆的推文，被張貼在一張完全不相關的照片上。這給人錯誤的印象，即牆的建造已經開始。

下一個例子是「冒名內容」(Imposter content)。冒名內容是一種錯誤信息或虛假信息，發生在新聞組織等真實來源被冒充時。有許多明顯的冒充內容的例子，尤其是在2016年美國大選的背景下。現已解散的“abcnews.com.co”不僅有一個幾乎與真正的ABC新聞相同的網址，而且還使用了非常相似的標識和整體網站外觀。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假新聞網站偽裝，看起來像真正的ABC新聞網站。

第三個例子是「操縱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操縱內容是指被操縱以欺騙讀者的真實內容，例如照片。原始照片被積極操縱以欺騙讀者。隨著數位攝影、強大的圖像軟件和操作技術的廣泛知識興起，這已經變得越來越普遍。電腦科學的最新發展也造就了操縱影像內容。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一張反槍抗議者的照片被操縱，使她看起來像是在撕毀美國憲法，而不是拿著一件藝術品。

最後一種虛假信息是「偽造內容」(Fabricated content)。偽造內容是指完全錯誤的新聞，旨在欺騙和傷害。例如著名街頭藝術家班克斯被捕的新聞，班克斯經常在照片上展示他的手，但從未公開他的真實身分。這其實不是他的照片，完全是假造的。虛假上下文、冒名內容、操縱內容和偽造內容是虛假信息有明顯意圖對閱聽人造成傷害的例子。至此我們可知假新聞可分類如下：

(一) 這幾種假新聞屬於虛假信息：

1. 虛假上下文
2. 冒名內容
3. 操縱內容
4. 偽造內容

(二) 這幾種假新聞屬於錯誤信息：

1. 諷刺或戲仿
2. 錯誤連接
3. 誤導性內容

而我認為，上述三種情況只有在屬於更廣泛的虛假宣傳活動的一部分的情況下，才算是錯誤信息。

在假新聞的背景下，還經常提到第三個概念。雖然我還沒有看到任何有關仇恨言論的學術討論，但是一般而言，仇恨言論和假新聞往往是相互聯繫但卻是不同的。所以我想簡單地談談「仇恨言論」，因為它有助於我們理解假新聞與仇恨言論的不同。

惡意信息(malinformation)基於事實，用於對個人、機構或國家造成傷害。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在法國，法律禁止競選活動的前幾個小時，總統候選人馬克宏的競選文件、電子郵件和會計記錄遭洩露。通過在非常接近法律禁令的時間點，將私人競選信息洩露，攻擊者打算盡可能地對馬克宏陣營造成傷害。雖然仇恨言論也造成問題，但洩露的信息實際上並非虛假，因此它與假新聞不同但有所關聯。

從傳播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建議將假信息概念化為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但並非所有假信息都必然存在問題，或都應該被描述為假新聞。假新聞最令人擔憂之處，在於部分虛假宣傳活動故意對社會造成傷害。眾所周知，這些活動並非僅存在於數位時代。所以我現在轉向第二個問題：數位時代的假新聞有什麼特別之處？

二、數位時代假新聞的具體內容

首先，當我們談論數位時代假新聞的特殊之處時，了解互聯網的興起帶來的變化是很重要的。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媒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一些與互聯網如何影響所謂的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新聞台、收音機有關；另一些變化是與信息如何傳遞以及互聯網作為溝通工具有關。

首先，傳統媒體曾經在社會中具有守門人功能，因此它們曾經是事件之間的媒介，並將事件信息傳遞給公眾。這就是「媒體」(media)一詞的來源，在拉丁語指的是中介者、中間的鏈接。然而，互聯網使人們成為信息的來源。互聯網的一個關鍵創新是，你可以讓一個公民，任何人，一個人成為一個信息來源，不再需要依賴中介者，因此，造成大量的訊息資源爆炸。

互聯網還將具備共同目標的個人些微的地理距離聯

繫起來，就像今天一樣，我們將來自世界上許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聚集在一起。了解彼此的工作要比過去容易得多，這造就了更多的專業化和多樣性。它讓像我這樣的人，生活在歐洲，仍然能成為更廣泛的華人社群的一部分。因此，少數信息提供者，轉變為更多樣化和眾多信息來源，從而決定新聞是什麼。有時甚至很難理解這些信息是否真的是新聞。這大大降低了傳統媒體的守門人功能。

另一個重要且相關的變化是記者也不再是新聞的作者。今天的機器人和網軍或「偽草根運動」，也能製造新聞。機器人是自動演算法，而不是人類在線模仿人類行為。而偽草根運動或網軍則是實際上在網上發布信息賺錢的真人。那些收費的隱藏貼文者或網軍通常被認為比機器人更有效，因為它們更能夠對人類行為的細微差別做出反應。

認識數位領域的另一個重點，是了解如何以互聯網為通訊工具，制定此信息活動或假新聞的策略。為了理解這些策略，了解這些活動背後的財務動機是非常有幫助的，讓我簡單地談談動機。

當假新聞是因財務動機而生的時候，生產者的目標就是賺錢。例如，來自馬其頓的青少年就是這種情況，他們在美國大選之前創建了一系列名為「US Conservative Today. com」或「USA Daily Politics. com」的網站，並刊登了一系列的新聞頭條，例如「2013年希拉蕊柯林頓曾說：我希望像唐納德川普這樣的人當選，他是誠實的、不受賄賂的」。後來被抓獲的網站所有者之一解釋說，他們是由財務動機驅動的。他們只是想提高他們的報酬，因為他們認為人們現在對政治很感興趣，因此他們發布了關於希拉蕊柯林頓的錯誤信息。

當虛假宣傳活動是出自經濟收益時，他們需要根據社交媒體上的營銷策略進行定位。要了解這些策略，了解社交媒體公司的商業模式會很有幫助。社交媒體公司的商業模式受到三個重要參與者的影響，分別是：

1. 尋求推廣商品和服務的廣告商
2. 在網站上提供廣告空間的出版商，如新聞機構等
3. 負責連結廣告商和出版商的中介商，如 Facebook 等

廣告商和出版商之間的配對會自動產生，這是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媒體提供的服務。關鍵點是，在許

多情況下，廣告不再僅在一個網站上靜態顯示。與傳統媒體不同，您可以在報紙的特定頁面上購買廣告空間，現在，Facebook 和 Google 等中介商能夠收集數百萬個用於製作個人化廣告經驗的數據資料，每個用戶都可以獲得各自的體驗。因此，廣告客戶通常不會在發布商的網站上購買廣告空間，而是支付中介商來分配廣告。

Facebook 2017 年 130 億美元收入的 98% 來自廣告銷售。Facebook 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商業模式。該模式表明，發布商利潤最大化的關鍵手段是增加其網站的流量。網站訪問者越多，預期的廣告收入就越多。這正是創建假新聞並使用 Facebook 平台作為吸引流量的渠道網站的基本運作原理。

在許多情況下，假新聞報導使用引人注目的新聞標題來確保用戶點擊率。這也稱為釣魚式標題（clickbait）現象。這些頭條新聞的設計，不僅吸引 Facebook 用戶點擊了解更多內容，還會在社交網絡中與朋友分享。實際的假新聞故事往往缺乏深度，網站主要是廣告。假新聞網站的所有者仍然可以通過這種模式獲得可觀的財務收益。根據 Sydel 於 2016 年提出的案例研究，多個假新聞網站的所有者表示其月收入在 10,000 美元到 30,000 美元之間。

當假新聞是從政治動機中而產生，這與財務動機有所不同，目標是通過誤導公眾相信與真實情況不符的錯誤敘述來動搖他們對特定主題的看法。

俄羅斯對美國和歐洲事務的干涉引起擔憂。歐盟委員會的安全負責人朱利安金在歐洲議會上，引述俄羅斯軍方將信息視為「另一種武裝力量」。他進一步補充說，「毫無疑問，親克里姆林宮的虛假信息宣傳活動是一種精心策劃的策略，通過盡可能多的渠道，以盡可能多的語言，盡可能頻繁地，提供相同的虛假信息故事」。俄羅斯的虛假宣傳活動中，假新聞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影響閱聽人並塑造他們的觀點。這樣做時，虛假宣傳運動的目的是破壞對制度的信任，並分化公民社會。

在這方面，學者們指出俄羅斯用於傳播假新聞的兩個最突出的手段：他們的外語新聞網 RT 和 Sputnik。Sputnik 屬於俄羅斯政府所有的新聞機構 Rossiya Segodnya，RT 則直接由俄羅斯聯邦的提供資金。RT 也

被俄羅斯政府視為重要機構。這些新聞機構的主要目標不是盈利，他們的目標是以與克里姆林宮政治目標一致的方式塑造國際事件的敘述。

在德國，RT 和 Sputnik 和其他幾家媒體報導了一則假新聞故事，指一名 13 歲德國俄籍女孩被難民強暴。它甚至導致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指責德國當局隱瞞此案，並在德國總理府面前舉行 700 人示威活動。俄羅斯傳播活動的具體手段是，他們經常使用機器人、偽草根運動或網軍在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上發布內容。

我以上所定義的假新聞背後的財務和政治動機，並不是新鮮事，但它們執行的形式是數位領域特有的。當前的模式受影響於社交媒體公司的基礎商業模式、自動化內容創建以及網路匿名的可能。

當然，俄羅斯不是唯一一個使用網軍作為傳播活動的一部分的國家。如下地圖顯示，在牛津大學計算宣傳研究計畫（Oxford University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和自由之家 2017 年的兩份報告中，世界上哪些國家也使用了偽草根運動。世界上所有地區的國家都使用網軍，包括美國、拉丁美洲、歐洲、後蘇聯地區和亞洲。臺灣在圖中有標記顏色，這是因為牛津大學的研究報告「強烈懷疑臺灣僱用網軍」，但臺灣政府從未證實這一點。將網軍的活動直接歸因於國家發起當然是一個問題，因此我決定在此透過兩個實證研究計畫提出以下觀點。



Data from Oxford University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 and Freedom House (2017)

那麼，數位時代的假新聞有什麼特別之處嗎？我會說有，也沒有：

沒有，因為假新聞不是數位時代的發明。虛假信息可以在沒有任何傷害意圖的情況下傳播，但它也可以是因財務和政治動機而為的行動的一部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最嚴重的問題是假新聞成為更廣泛的虛假宣傳活動的一部分。當然，這些活動在互聯網發明之前就已經發生過了。

但我也會說，有的，有一些具體的東西，主要是假新聞作為網路傳播活動的一部分時，進行傳播的方式。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媒體的守門人功能已經減少，新的行為者開始出現，包括網軍和機器人。社交媒體公司的基本商業模式特別決定了假新聞傳播的策略和方式。

三、處理數位領域中的假新聞的幾種方法

現在讓我談談我演講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即關於當前在數位領域處理假新聞的方法的辯論，我想提出一些問題，以便進行更廣泛的討論。首先讓我舉幾個已經採取一些國家舉措來處理假新聞的國家的例子。

我的國家德國，於 2017 年通過了「網絡執法法案」，這一舉措始於一位名叫 Renate Künast 的政治人物，曾擔任德國議會也就是德國聯邦議院中綠黨的主席。當然，如今的政治人物不僅擁有自己的網路公共帳號，通常由公關人員管理，而且也有自己的私人帳號。因此，Renate Künast 從 Facebook 上的一位朋友那裡收到了關於她自己的假新聞。她的朋友問這是不是真的。所以，她採取了行動，但要求消息被刪除時遇到一些困難。於是她開始與德國聯邦議院的其他議員討論。在大選前不久，議會的許多成員開始擔心右翼社會主義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操縱社交媒體的可能。於是，他們發起了一項法律，該法律是在創紀錄的短時間內起草的，實際上沒有經過太多討論，並且在選舉前不久通過。然而，法律本身僅在選舉後實施。

法律的最終結果實際上從未提及假新聞這一術語，而是旨在解決「非法內容」。德國社交媒體已經證實，

這項法律將導致他們刪除許多他們認為不必刪除的信息，因為如果他們發布非法內容，他們將需支付非常高的罰款。但他們爭辯，對他們來說非法內容的定義非常不清楚，如果你把 20 名律師安排到一個房間裡，每個律師都會對哪些內容合法或非法有不同看法。他們發現很難具體決定什麼是合法或非法的內容，所以他們只好採取一些先發制人的措施，這將導致社交媒體公司的大量審查。

有趣的是，其他國家，例如新加坡，已經引用德國法律作為榜樣，作為在線刪除非法內容的積極手段，而俄羅斯、巴西、菲律賓和其他許多國家目前正在討論與德國法案類似的法律草案。包括瑞典、愛爾蘭和捷克共和國在內的其他歐盟國家，則正在評估或推動反假新聞立法。法國目前正在討論今年初馬克宏政府所起草的反對錯誤信息的法律，該法律旨在允許法官在選舉期間下令刪除虛假的網路內容。法國議會預計在 2018 年 7 月討論這項法案。

然而，歐洲也出現了一些反對這種作法的相反意見：今年初，西班牙國會拒絕政府立法打擊假新聞。歐盟委員會非常密切地研究了德國的網絡執法行為，但迄今為止，拒絕建議以歐洲法律立法保護其 28 個成員國的選舉受干涉，相反地，歐盟委員會目前支持教育計畫和部分社交媒體公司的自我監管。

正如你所看到的，世界上對假新聞的關注越來越多，而各國在以政府法規打擊假新聞的方法上存在分歧。在這些辯論當中，劍橋分析公司的醜聞對社交媒體公司帶來了壓力，使得他們在處理虛假新聞時必須承擔更多責任。讓我來介紹一下劍橋分析醜聞：

Facebook 關於第三方數據使用的政策，使外部研究人員可以通過心理測驗應用程式獲取 8,700 萬用戶的相關信息。我在柏林訪問的開發人員，大多不覺得這有任何值得驚訝之處，因為這是科技界多年來非常普遍的狀況。通過這種機制，一家名為劍橋分析的公司獲取數據，然後制定有針對性的廣告活動，藉以支持唐納德川普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表現。

醜聞發生後的兩週內，Facebook 的股票價值下跌了近 20%，當所有事情曝光時，一個鼓勵用戶「刪除 Facebook」的運動，得到了娛樂和科技行業眾多知

名人士的支持。4 月初，Facebook CEO 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被要求接連兩天在美國國會針對此醜聞作出證詞。針對這一醜聞，馬克扎克伯格發表了以下聲明：

首先，Facebook 將調整新聞演算法，以減少鏈接到低質量內容的廣告和貼文的數量。所以 Facebook 承諾要做的是，他們將通過演算法給予高質量媒體信息高評價。他們也將阻止，並可能刪除被舉報重複發布虛假信息的用戶。這種變化的基本原理是，從公司的角度來看，扎克伯格指出，假新聞成本太高，因此調整演算法是公司的利益所在。

祖克柏所做的第二項宣布與網軍的問題有關。他從公司的角度將此描述為安全問題，這意味著它是 Facebook 無法完全解決，但至少可以減少問題。為此，Facebook 現在尋求加強與政府的合作，以利用他們關於各國假新聞的專業知識，採取一些具體步驟，如禁止虛假賬戶。

第三項宣布是，Facebook 將與事實審查機構密切合作，這些機構將協助檢查內容。

儘管 Facebook 似乎對這個問題有了全面的了解，但這些聲明一直受到批評，因為它並不是很明確，因為 Facebook 不是一個透明的組織，目前尚不清楚 Facebook 將在多大程度上堅持這些聲明，而大眾不斷要求的便是提高透明度。

讓我簡單地談談一個目前較少受到公眾辯論，但我認為我們都應該了解的重要政策選擇。

首先，社交媒體行業越來越意識到他們需要做一些事情，我剛剛介紹的 Facebook 聲明已經說明了這個情況。來自業界的論點包括，國家立法並非基於對社交媒體如何運作的現實等。因此，業界提出了自我監管措施。一些關於自我監管措施的例子如下：

2016 年，Facebook、Twitter、Youtube 和微軟，簽署了歐盟委員會「關於打擊非法仇恨言論的行為準則」，承諾採取措施及時監控和刪除非法貼文。委員會的年度評估表明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四家公司現在已經刪除了 70% 受舉報的在線仇恨言論，其數量從僅 28% 增加到 70%。

其他提高透明度的舉措還有「全球網絡倡議」，2008 年，微軟、Google 和 Yahoo 推出了全球網絡計畫

(GNI)，後來又加入了 Facebook。作為此計畫的一部分，Google、Twitter 和 Facebook 會定期發布有關其內容控制的報告。這些報告可以在線上查看，這裡有一些例子。

對此類方法的批評者質疑，自我監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解決問題。具體而言，批評者認為社交媒體公司的商業模式依賴於用戶數據，以便更有效地定位廣告，而且他們對任何內容都感興趣，而不管它是否是假的，只要能引起用戶的注意。

此外，公司試圖審查內容以解決仇恨言論和虛假信息的行為，受到了偏見和雙重標準的批評。在科技業工作的開發人員實際上並沒有像記者一樣接受職業道德培訓。因此，開發人員經常使用他們自己的個人道德標準，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這完全取決於誰負責審查，因此對於用戶來說，內容的處理方式沒有明確的一致性。

另外還有其他做法是關於媒體教育。例如，Youtube 已經發起了一些舉措，他們試圖與擁有大量粉絲的人合作，有的是明星，以便專門處理虛假信息或假新聞。當然，學者或知識分子也主動增進年輕人對媒體的了解，教導他們如何區分虛假信息，以及如何面對這些網路營銷策略。

媒體教育的一個問題是回報來得很慢。因此，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如果你現在認為右翼民粹主義有問題，媒體教育可能會在 15 或 20 年之後見效，但卻無法立竿見影。所以雖然這些長期影響很重要，但我們還需要考慮短期舉措。

最後，我想談談臺灣目前的做法。我不是臺灣領域的專家，所以這是我有限的理解，也很歡迎大家的意見。截至目前，臺灣沒有國家立法來處理假新聞，而是著重

在媒體和社會的力量解決這個問題。據我所知，臺灣的第一個事實檢查組織，將在 7 月成立，以處理相關問題。

最後，我要指出，作為學者，我們討論如何有效應對數位時代虛假信息的挑戰時，需要從加強概念化開始，讓我們能夠明辨數位領域的假新聞現象。我建議，把重點放在對人們、機構和社會造成傷害的虛假宣傳活動的一部分的假新聞上，這其中可能包括了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

我在此提出，網路假新聞內容有其具體特色。首先，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媒體的守門人功能已經減少，並且出現了很多新的行為者，如網軍和機器人，難以在網上識別，至少大眾很難一眼識破。此外，社交媒體公司的基本商業模式塑造了假新聞的傳播策略和方式。

我們研究假新聞現象時，必須面對如何處理和管理它的問題。早期的互聯網曾經幾乎只為科技行業的開發人員所用，接著在 20 世紀 90 年代，它成為一個商業化的空間，公司出現並開始尋找實際從中獲利的方法。這為各國政府管理和控制網路空間的努力立下了基礎。特別是愛德華史諾登的事件，以及英國脫歐後極端右翼政黨的威脅，使得歐洲各國政府特別擔心網路假新聞。

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是根據時間壓力下的威脅感做出決策。當我們面對數位科技時，常常會覺得它發展得如此之快，以至於總是覺得落後一步。不過，我認為可以藉由過去了解有關數位科技影響的基本情況和機制。過去的這些基本策略、情況和機制能幫助我們理解現在。

我在此祝賀今天會議的主辦單位，使我們能利用這個機會實際認識假新聞現象，並思考這些情況。希望我為你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靈感。非常感謝。